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HB15WX037



1916: 新文学发生的年代学研究

张瑜 著

 人民出版社

1916： 新文学发生的年代学研究

张瑜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16:新文学发生的年代学研究/张瑜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2

ISBN 978-7-01-018716-7

I. ①1…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8794 号

1916:新文学发生的年代学研究

1916 XINWENXUE FASHENG DE NIANDAIXUE YANJIU

张 瑜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5.5

字数:376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8716-7 定价:5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16：新文学发生的年代学研究》（项目编号HB15WX037）的结项成果，由河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河北省重点学科经费资助出版。

序

或许是机缘巧合,或许是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我带的三个硕士闫红、邓招华和张瑜,先后都投到魏建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前几年,闫红的博士学位论文《铁凝与新时期文学》出版时让我写序,我对她讲,序理应请魏建老师来作,因为在你的论文中浇灌着魏老师的心血与智慧,他对论文最熟悉,也最有发言权。可是反复说了几次,魏建先生只答应写跋,而坚持让我来写序。这次张瑜的博士学位论文《1916:新文学发生的年代学研究》即将付梓,最有资格也最适合写序的魏建先生还是坚持他写跋,让我写序。魏建先生的文才与口才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人所共知,我自知既辩不过他也拗不过他,所以虽知其难为也只能勉力为之了。

张瑜是1999年考入河北大学中文系读本科的。当时学校正在倡导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改革,中文系从当年招收的100多名新生中挑选出20名成绩比较好的学生组建了一个小班,称为“基地班”(“基地班”的名称源于当时河北省政府确定河北大学中文系为河北省中文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作为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改革的试点班。其实与其他两个大班相比,只不过多开了一点素质教育和专业外语的课程而已,没有大的区别。我当时在中文系主管教学工作并兼任了“基地班”的辅导员,张瑜是班里的班长。本科毕业推免读研后我又被指定做她的导师。在本科和硕士的学习阶段,张瑜给老师们的印象是有悟性而又勤奋好学、做事严谨、责任心强。作为学生干部,她为学院和同学们做了许多繁杂的“义务劳动”,但她的学业没有因此而受影响,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她的硕士论文《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考辨》被评为河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张瑜硕士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工作。那时我全面负责学院的行政工作,

除正常的教学科研与行政管理工作之外,应对教学评估、申报学位授权点、重点学科、科学研究基地、教学质量工程项目等应接不暇,自己当时感到身心疲惫,基本上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关注张瑜的学业了。只是在准备申报学科或精品课评估材料时想到张瑜做事严谨认真,让她做了不少事物性的繁琐的工作。2009年,张瑜考取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此后四年,张瑜是全身心地投入攻读博士学位的课程和论文撰写之中,虽然我们之间见面交流少了,但她学习的情况与学业的进步我还是知道和了解的。因为常和魏建先生一起开学术会议,见面谈起张瑜的学习与论文撰写情况,魏建先生对她是满意和赞许的。再就是看到她博士论文的一些中期成果陆续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也表明了她在学术上的不断进步。毕业回校后,张瑜把她的博士学位论文送了我一本,当时因琐事繁多,略翻了翻就放下了。现在放下杂务仔细阅读,欣喜地发现张瑜呈献给学界的是一项坚实丰硕而颇多新意的成果,也切实感到通过四年读博的艰苦学习与训练,张瑜在学术上完成了由蛹化蝶的成功蜕变。

《1916:新文学发生的年代学研究》可以说是研究现代文学发生学的一项扎实而又有创意的新成果。文章既不唯新是鹜,也不囿于成说。而是从年代学的角度立论,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学场域学理论,通过大量钩沉和仔细阅读当时的报刊书籍来触摸或重构那个时代的“文学场”,凸显1916这一特定的历史年代所孕育形成的促使新文学发生的诸多要素,从而彰显出1917年新文学发生的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论文以年代学和场域学为理论支点设置了一个合于逻辑而又浑然一体的理论框架,先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与报刊出版的现代转型考察新文学生成的现代传播空间;而后从现代传播空间的“以文取酬”考察知识分子身份的转换,即从传统的“士”到有自主性意识的作家的生成;继而从考察新式学堂、社会教育、学会、社团、留学生、国文与国语教育等,来显现新文学接受群体——读者共同体的建构与生成;之后考察论述当时出版界由纷乱无序逐渐走上秩序化的历程,即文学市场机制的形成。正是文学的新的传播空间的出现、具有自主性的作家群与新的读者共同体的形成及文学市场机制的建构,为新文学的发生提供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文学场域,使《新青年》能够绝处逢生,站上引领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历史制高点。促

使中国文学完成了自传统至现代的历史性转型。这种着眼于新文学发生的内在演进发展而又逻辑清晰史料翔实的论证是有很强的说服力的。对我们深入思考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重新认识 1916 年的文学史地位与价值以及《新青年》在当时的“文学场”内的占位策略等都极具启示意义。

现代文学的起点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现代文学界一直热衷讨论的一个话题。1985 年 5 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三位先生首次以“民族——世界”为横坐标,“个人——时代”为纵坐标的宽阔的眼界,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尽管这种以两个世纪的交点作为新文学发生的起点的划分并不精确而富于科学性,因为文学的发展变化不一定都要等到世纪之交的交界点上。但这一命题的提出,对于打破人们长期形成的以政治为核心的一元思维模式,动摇以往的文学史的政治构架具有相当大的启示和促进作用。此后诸多学者都主张把现代文学的起点向晚清推移。出现了多种版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到 21 世纪初,华裔美籍学者王德威先生开始致力于在晚清小说中探寻现代性因素,在其专著《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中主张“晚清,而不是‘五四’,才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兴起的最重要阶段。太平天国乱后出现的各种小说已谱出各种中国文学现代化可能的方式。”提出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这一命题虽然被一些学者批评是以模糊晚清到五四的历史界线而颠覆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偏狭之见,但也再次激发了一些学者向晚清寻找现代文学起点的热情。如范伯群先生在《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向前移”问题》(《江苏大学学报》2006 年第 5 期)中提出 1892 年韩邦庆发表小说《海上花列传》应该是现代文学的起点。而严家炎先生则在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中以黄遵宪在 1887 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提出“言文合一”的主张;陈季同在 1890 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1892 年《海上花列传》开始在《海上奇书》上连载等史料为依据,提出现代文学的发端应该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这些学者为拓展现代文学研究空间而开疆破土的努力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但时间虽然向上拓展了 30 年,而找到的文本却只有区区两个,无异于千顷地里一棵苗,研究疆域的拓展并没有带来研究对象的增加。此外,近些年来一

些学者以“民国文学”或“民国机制”来置换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自然他们也就把民国创立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自然,朝代的更替会影响到社会的风气和民族的心理从而影响到文学的风格和面貌,所以这种“断从朝代”的分期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也符合古代文学的分期传统。但是,新文学取代旧文学不仅是文学风格或题材体裁的变化,而是从语言载体到思想理念的彻底地破旧立新,所以用“断从朝代”的方法来划分由传统到现代文学转型却又不尽妥当的。所以,无论是以二十世纪这种整体的时间切割,还是以晚清某个特殊个案,抑或以朝代兴替来划定现代文学的起点的方式,均没有考虑新文学形态发生的“文学场”这一重要的文学要素。张瑜在论文中没有对有关现代文学发生的诸多不同观点进行逐一的辨析或反驳,而是重点考察1916年前后的文学场域,即随着现代传播空间的出现而逐渐形成的具有自主性意识的作家群、读者群及文学市场机制的建构与形成。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文学场域的形成,是新文学发生必须的文化背景。事实上,晚清便有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等人的文学改革倡导,也有白话文的倡导主张,但新文学运动却并未发生。……新文学运动的发生之所以以《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的发表为标志,或者说之所以选择1917这个点,就是因为在1916年前后,新文学场的建构基本完成,新文学场为新文学提供了发生的合理性与可能性。”(论文第四章结语)这一基于事实与材料而又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的结论是很具说服力的。

在以往的现代文学史中,1916年是被忽略或被遮蔽的。在一般人的印象中,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发生;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揭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标志着由“人的文学”向“阶级的文学”的转向;1930年“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左翼文学主流地位的形成;1936年“两个口号”的论争标志着左翼文学向抗战文学的转折;1942年的延安文艺整风标志着文学上“延安道路”的确立;1949年全国第一届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现代文学的终结与当代文学的开启。而1916年则从这些具有标志性的年代中漏掉了。张瑜的论文,尽可能地还原了1916年的文学场域,使我们真正了解和感受到1916年这一现代文学十月怀胎的孕育期的重要。正是1916年前后形成的现代意义上的作家与读者群体

及文学市场机制,才构成了现代文学的发生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所以,1916年是新文学发生的临界点,其文学史地位与价值不容忽视。就像作者在论文导言中所说:“虽然中国文学的新陈嬗代,不能简单地以1916为分水岭或界碑石,但1916对于新文学发生而言,却是极为重要、关键的年份之一。”

人们印象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似乎就是《新青年》横空出世,挂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于是万众景从;而五四文学革命,也是胡适、陈独秀振臂一呼,于是应者云集。这种简单的惯性的概念式的认识,使我们自认为了解了历史事件的本质与必然,不愿再去探讨和了解历史存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张瑜的论文则努力“还原”历史现场,以多元的视角对诸多历史事件进行重新审视,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如作者根据布迪厄文学场是“诸多力量较量之场所”,“竞争的中心焦点是文学合法性的垄断”,“获取文学场话语权力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对文学进行重新命名”的理论,认为新文学的发生不仅仅是一场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结果,而是在新的文学场域建构几近完成的情况下,旨在争夺文学话语权(或言文学场权力)的占位斗争。《新青年》与北京大学的联姻使之获得了先进的思想文化资源,其提倡新文学就是为获取文学场话语权而对文学进行的重新命名,以达到对文学的“合法性的垄断”。“当新文化运动宣称那些执着于旧文学的作家和读者都是阻挡新思潮的拦路虎,是违背时代发展的逆流时,新青年同仁们也在事实上否定了那些作家以文学启迪蒙昧、救亡图存的资格,并由此确证了自己的合法性地位。”“‘双簧信事件’也正是《新青年》策划的占位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即通过命名(‘新文学’)——再命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的信)——对再命名进行否定(刘半农的回信)的方式,反复论证了新文学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论文第五章第二节,文学与权力——对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种解读)这种对《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解读新颖而极具启示意义。

读张瑜的博士学位论文所受启发很多,不能一一尽言,以上略说几点感想,算作序言,聊表祝贺之情。

田建民

2017年4月1日

目 录

序	田建民 1
导 言	1
第一章 1916:社会的扰攘与文化的坚守	21
第一节 小语境:1916 年的文学环境	23
一、舆论界“危如累卵”	23
二、“呜呼洪宪”	27
第二节 大历史: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33
一、“大雨之先”:晚清以来的时代背景	33
二、从发表到出版:文学传播空间的建构	34
小结:横向停滞导致纵向拓展	57
第二章 “码字的症候群”:知识分子的生存与发展	59
第一节 “码字的症候群”:1916 年的文坛怪现象	60
一、媚俗与模仿	61
二、抄袭	63
三、一稿多投与应酬文章	69
第二节 文人自主性愈加彰显	71
一、从士到作家:人格独立的开始	72
二、从“经国大业”到“以文取酬”:独立的经济来源	77
三、作家自主性的意义呈现	83
小结:消耗与打磨,多重境遇空间	91

第三章 读者共同体与时尚的风向标	93
第一节 阅读共同体的形成	94
一、读者共同体的建构	96
二、从国文到国语:读者与作家共同的教育背景	109
第二节 读者主体性的浮现	131
一、众声喧哗:读者的意愿表达	131
二、商榷批判:由“推襟送抱”引发的文战	134
小结:群体性准备的完成	145
第四章 文学市场化——也谈民国机制	147
第一节 1916:摇摆的洪宪元年	148
一、复辟帝制与尊孔读经	149
二、出版界之黑幕	150
第二节 对秩序的呼唤	154
一、国歌与校歌:文学与仪式	154
二、文学市场机制的形成	157
小结:文学场形成的制度化保证	191
第五章 1916 与新文学的发生	193
第一节 新的文学场域的形成	194
一、为新文学提供独立的生存方式和广阔的传播空间	197
二、公共舆论空间的开创	200
三、拓展文学的表现领域,催生新式文体和白话语言	201
第二节 文学与权力——对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种解读	205
一、《新青年》的占位传奇	207
二、新文学对文学权力的攫取	211
小结:对新文化运动的再审视	217
结语:和尚·公文·衣包·雨伞·枷	220

参考文献	222
附录一:晚清至民初中文期刊创刊情况表(1872—1916)	248
附录二:晚清至民初上海出版机构一览表(1840—1916)	347
附录三:1916 年大事年表	356
附录四:1916 年前后出版、发行的报纸、刊物列表	363
跋	魏 建 371
后 记	385

导 言

一、问题的提出及选题的意义

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终结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起始,新文学的意义无疑是划时代的。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新文学”是在古今中外剧烈的文化碰撞与融汇中形成的,其丰厚的思想内蕴、斑斓的艺术风貌、深远的历史影响,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学人。随着评判标准的变迁和言说空间的拓展,新文学俨然成为中国文学研究序列中的一门显学,对现代文学发生期的阐释也已然成为研究者无法绕开的一道门槛。尤其是学术界对文学史研究有了更为清晰的本体和历史认知之后,从史料、原典出发,在“五四运动”这一赋予新文学命名的精神事件之外,探源新文学的发生,成为当代学人打破范式、创新学术的课题之一。在“不停地反思,不停地调整,不停地转型,在发展中建构,在建构中发展”^①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本逻辑的指导下,以探源研究为框架,以命名、发端时间、历史动因等问题为核心,以新、变等现代性追求为鹄的的研究模式,已成为主导性“范式”,潜在地支配、引导着大多数研究的展开,其终极指向是触摸历史,回到“五四”。

然而,历史是回不去的。任何解释历史的人,都企图达至“客观”。但是,作为阐释主体的研究者,“解释”这一行为只能是“主观”的。“任何对事实的陈述都是对事实的解释,从浩瀚的资料中选取所需资料本身就是一种解释;最终的选择不在于客观的和主观的历史之间,而在于对过去的高尚、丰富的解释和过去的卑劣、贫乏的解释之间。”^②毕竟,“历史是一真实预言的手稿,任何人

① 刘勇:《现代文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② [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李洪润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959页。

都不能充分解释。”^①任何人也都能参与解释。因此,尽管新文学发生研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却仍有可观的阐释和开拓空间。本书试图从年代学的角度立论,考察新文学发生期的关键时刻——1916年的中国文学,并在此基础上回顾新文学权力的获取过程及其占位策略,以场域理论的视角探源新文学的发生。

梁启超在解释《新中国未来记》为何用两种时间展开叙述时说:“纪年者何义也?时也者,过而不留者也。……至无定而无可指也。无定而无可指,则其所欲记之事,皆无所附丽。故不得不为之立一代数之记号,化无定为有定,然后得以从而指名之,于是乎有纪年。”^②既然“纪年”是为了使无定的时间变得“有定”、变得有秩序。那么,作为一种时间符号,年代本身就暗含着历史叙述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其次,以考索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的发生时间为宗旨的年代学,虽“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是一种时间尺度,一种编次年代顺序的方法”^③,但编年本身即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依托,所以年代学的另一重含义便是“事件性”。此外,“年代学”不是简单地“给历史发展的时间和事件的先后顺序提供了明确的界线”,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将其某些现象进行系统的整理,归纳分类,洞察事物的本质内涵,揭示其内在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规律。”^④就此而言,将年代学运用于新文学发生研究,不仅便于寻找中国文学史地图中的“地标性建筑”,在小历史的微观聚焦中探寻大历史的共同经验;更有助于研究者以综合性的眼光和跨学科的视野来重建或恢复某种历史境遇,检视、评判各种历史事件,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关键时刻”的辐射性力量。

1916年是本论题最终确定的研究平台。晚清至“五四”是中国社会经历着剧烈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这是一个情绪炽热、充满紧迫感和离心力的时

① [英]卡莱尔:《论历史》,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7页。

②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四·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0页。

③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 30 volumes), 1980, vol.4, p.572. 转引自姜涛:《关于历史年代学问题》,《安徽史学》1993年第3期。

④ 刘文鹏:《古代埃及的年代学与历史分期》,《世界历史》1996年第2期。

代,几乎无人能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①权威真空、言论自由造就了一批社会英才,强力、过激、亢奋等是其特有的风姿。这一由情势所逼,又由情势提供的思想平台,由于文学的参与,为时人留下了足够的心理调试时间和应对空间,让人在不遭受过重心理挫折的前提下接受了新的生活方式与言说方式。于革故鼎新时代中,于西方思潮裹挟下,重新认知中国文学现代之路的千头万绪,可谓正当其时。于是,历史选择了“五四”。

“‘五四’这个点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文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酝酿的结果。”^②“五四”文学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枢纽,新旧文学的矛盾、中西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国文学在现代化道路上所遇到的种种问题,都汇聚于此。而1916年,作为中国文学发生根本变化的那一刻、那一点,则肩负着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担^③。正如万历十五年的那次朝会,没有风云际会的1916,历史或许要改变航向。可以说,在新文学发生这一完整的“故事”中,1916年虽然只是“事件”之一,却是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关涉到中国文学走向之诸多方面的建构。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自第2卷第1号起更名为《新青年》;1916年12月26日,时任总统的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于次年1月4日到职。看似无关的两个事件,却因蔡元培诚邀暂居前门外中西旅馆的陈独秀出掌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起了关联,并从此改写了中国现代史。

学术界已达成共识的是:“学府与报刊出版的结盟,为中国新文化(文学)的发生提供了切合新文化(文学)特征而缺之不可的‘外缘’性因素,滥觞于‘一校一刊’的五四新文化(文学)运动正是在‘公共空间’的激烈对峙中演化成大势的。”^④一校(北京大学)一刊(《新青年》)的结合,源自蔡元培掌校后开

① [美]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雷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

② 刘勇:《现代文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③ 注:按照文学史约定俗成的说法,1917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那么,1916则是现代文学的子夜时刻——既是中国文学前途未卜的混沌时期,也是新文学即将登场的黎明前刻。当然,所谓的“黎明”有各种可能,或许新文学自此亮相,也或许传统文学重掌文坛。因此,1916究竟走向何方于时人尚是未知。

④ 陈方竞:《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创的变革性思想。其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和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引领北京大学在从“天下”到“万国”的转变中,最终完成了中国旧式学堂向现代高等学府的蜕变。在此过程中,《新青年》及其作者群的介入,有效地为北大的改革提供了新鲜的思想文化资源。此后与复古派的论争,也成为蔡元培“自由主义”思想原则的经典体现。而此刻处于瓶颈期的《新青年》也急需寻找学术团体作为依托,将其变革性思想发扬光大。编辑部迁至北京后,《新青年》的影响将不再局限于上海及其周边。《新青年》同仁^①之先后执教北大,也迫使为新文学摇旗呐喊的一代学人沉下心来将各自主张系统化,为新文化运动的良性发展提供坚实的学理依据,有效地避免了思想启蒙呐喊期的悬浮性。毋庸置疑的是,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的结合,是双方在充分认识并获取对方所占有的现代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互惠互利的双赢合作,“其效果绝非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产生的是现代思想文化资源连锁性的增值与弥散效应。”^②其影响力波及整个现代文学史,甚至绵延至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1916年是促使中国文学完成自传统至现代这一华丽转身的关键时刻。

当然,1916年的中国文学本身蕴含着无限可能。如,该年10月,上海《时事新报》开辟“上海黑幕”专栏,黑幕小说逐渐风行;南社文学活动更加频繁,关于唐宋诗的争执愈演愈烈;袁世凯倒行逆施,倡导尊孔复古的同时,暴力打击有识之士,限制舆论自由;等等。但中国文学毕竟走向了“新”的一途。是必然还是偶然?“尽管习惯于所谓‘必然性’和‘历史规律’来解释一切的人不承认历史过程中偶然和巧合的作用,但偶然和巧合仍往往令人怀疑真有一个上帝或一个魔鬼在冥冥中操纵着一切。”^③事实上,“历史已经一再告诉我们,许多新发明、新实验尽管有无限乐观的承诺,却竟然是时间无常因素下的牺牲。……用生物史学家高德的话说:‘只要稍稍改变事件初启的任何一个关键,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整个物种进化的过程将会形成截然不同的途

① 关于该词的使用,邱峰在《“同人”和“同仁”》(《咬文嚼字》2012年第4期)一文中做了较为详尽的解释。本文除引文尊重原著者采其所写之字外,其他部分都用“同仁”一词,以示对民国学人的尊重。

② 陈方竞:《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③ 王彬彬:《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径。’”^①如果陈独秀没有于1916年11月26日离沪北上,如果没有蔡元培恰逢其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如果蔡元培没有亲赴旅店诚邀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如果没有1916年11月胡适挥毫写下《文学改良刍议》并得到陈独秀的认可……历史将以怎样的面目呈现?难以想象,因为历史没有假设!

“民国初年,即1912年至1916年,在近现代之交的思想文化变革中曾经是一段被悬置的历史;悬置的原因在于其灰暗,人们很难从中找到些微的亮色。”^②但正如上文所述,新文学恰恰是从这不堪回首的岁月中走来。作为文学革命发生的子夜时刻,1916承载了太多的“灰暗”,但也正因此,1917年之后的新文学之大放异彩方显得如此醒目。是时候让1916浮出历史地表了,尽管相对于光荣的1917和特征明显的1898、1921等要艰难很多。但是,锁定若干标志性事件,让作为事件的1916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也并非绝无可能。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一章《史的目的》中写道:“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③。回顾1916,反思新文学之所由来,探寻文学经由1916走向“新”途的艰难历程,“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④,在对过去的真事实进行合理解读的同时,透视新文学发生及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即是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研究现状及创新空间

经过近百年的探索,新文学的发生研究已然衍生为独特的话语体系,形成了以历史命名、发端时间、动因探源等问题为核心的较为稳定的研究框架。对新文学研究之研究也渐成规模。“然而,在取得丰硕成果,获得自足性的同时,还应注意的是:‘范式’的稳定,或许同时带来了某种封闭性。……当‘范式’的合法性被充分认识并被广泛接受,最初新锐的发现,往往会被普及化为一种‘常识’;而社会、历史以及精神氛围的变迁,又使‘范式’得以存在的历史

①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页。

② 陈方竞:《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页。

④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页。